

“都省书画之印”新考*

——兼谈“礼部评验书画关防”的时代

赵 晶

内容摘要:“都省书画之印”并非元代中书省或秘书监官印,应系明初中书省官印,该印的使用时间不早于朱元璋即吴王位的至正二十四年(1364),使用时间的下限为洪武十三年(1380),此后不再使用。此印主要钐于刻本书籍、法书墨迹、碑帖拓本及绘画册页。钐于绘画册页是由于册页的装帧形式与书籍相近,明初被归入典籍类。该印很少见于绘画立轴和手卷,若出现则该立轴或手卷大多真伪存疑或装裱形式经过改造。“都省书画之印”往往与“礼部评验书画关防”同时出现,后者应系明初礼部书画库官印,使用时间的下限同样为洪武十三年。两印的使用可能与拨付相关典籍类藏品给大本堂或秘书监等机构有关。“都省书画之印”“礼部评验书画关防”“监察司印”均为明初官印,在使用时间上存在一定的重合期,随着中书省、礼部书画库、大本堂、秘书监的先后废止,相关典籍归翰林院保管,法书名画则汇集到内府监察司中,并在洪武十七年后为司礼监所继承。

关键词:都省书画之印 礼部评验书画关防 司印 中书省 秘书监

引言

元代宫廷的典籍书画收藏十分宏富,集中了宋、辽、西夏、金宫廷收藏的精华。但收藏目录并没有流传下来,只有一些零散的文献提及元内府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明代宫廷与浙派绘画史料整理与研究”(22BF098)阶段性成果。

收藏的情况及部分作品。今天的研究者在述及元代宫廷收藏时除了利用文献记载外,主要通过典籍、书画上的元代官印来判断是否为元代宫廷旧藏。

“天历之宝”“宣文阁宝”“宣文阁图书印”“奎章阁宝”“都省书画之印”等通常被视作元代内府的收藏印,再加上元代大长公主祥哥刺吉的“皇姊图书”“皇姊珍玩”等印,构成了判断元代皇家及皇室成员收藏的主要依据。上述印章中,“都省书画之印”(见图1)便是一方常用于判断元代皇家收藏的重要印章,此印屡见于存世的元以前书画作品以及宋元版图书上,约3.4至3.5厘米见方,大致合元官尺一寸^①。“都省”在唐宋时期指统领六部的尚书省,元代废三省制,大多数时候以中书省统领六部,故元代“都省”指中书省。所以,“都省书画”当指尚书省或中书省所藏典籍书画,由于此印已见于元人鲜于枢《草书杜甫魏将军歌诗》(故宫博物院藏)及元刻本《资治通鉴》(国家图书馆藏),故“都省书画之印”不可能为唐、五代、宋尚书省所用,只能是元及元以后的官印。



图1 “都省书画之印”
选自克里夫兰博物馆藏
佚名《白梅翠禽图》

至晚从清代中叶开始,“都省书画之印”已被视作元代官印。黄易旧藏《范式碑》拓本(今藏故宫博物院,藏品编号:新00046690)上有翁方纲乾隆四十九年(1784)跋云:“是碑標册之首有‘都省书画之印’。按,是印为元内府鉴藏所用,则是本为宋拓无疑矣,特字有残失者,所以更少于洪氏之本耳。”另有黄易乾隆五十四年跋,介绍得此拓本的经过并称:“此碑有元内府‘都省书画之印’。”今天的不少学术著作或工具书在介绍此印时亦沿袭清人的判断,将此印归入元代官印^②。20世纪70年代,傅申进一步指出都省为元代秘书监的顶头上司,钤有此印的作品“必与秘书监有关”^③。此观点是目前主流的看法,并被写入相关教材中^④。

①杨平:《从元代官印看元代的尺度》,《考古》1997年第8期,第89页。

②如庄严主编:《晋唐以来书画家鉴藏家款印谱》第1册,香港艺文出版社,1964年,第176页。

③傅申:《元代皇室书画收藏史略》,台北故宫博物院,1981年,第94页。

④杨仁恺主编:《中国书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378页。

一、“都省书画之印”作为元代秘书监或其他元代官印的可疑之处

虽然目前学界通常将“都省书画之印”视为元代内府官印或秘书监收藏印,但这一结论尚有若干疑点。

第一,元代秘书监并非中书省直接下属单位,以“都省书画之印”来钤盖自身收藏颇为可疑。元代中书省直接下辖的部门是六部,不包括秘书监。秘书监和大司农司、宣政院等都独立于中书省,是分管具体事务的专设中央机构。元代《秘书监志》中频繁提及都省,一是因为相关请求事项涉及中书省下属机构的职权,如官职添设便关系到中书省下的吏部。二是因为元代规定“诸内外大小事务并听中书省区处奏闻”^①。因此《秘书监志》中出现大量和中书省有关的事项并不奇怪。

第二,存世钤有“都省书画之印”的书画作品之少与元代秘书监书画收藏之多形成了强烈反差。元代秘书监的书画收藏汇聚了宋、金内府书画的精华,加上元代本朝的收集,数量十分宏富。《秘书监志》谓:“本监所藏俱系金宋流传及四方购纳,古书名画,不为少矣。”^②至正二年(1342)统计,不算书籍及碑刻拓本,秘书监有书画“二千单八轴”,其中“法书四百八十二轴”(包括立轴 83,手卷 399),“名画一千五百五十六轴”(立轴 1155,手卷 371),另有“看册七帙”^③。但传世法书、名画中钤有“都省书画之印”的,除去明显的伪迹,不到二十件,这其中除了少量法书外,基本集中于绘画册页,这就与元代秘书监至少两千余件的书画收藏存在明显落差。当然,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历经六百多年,绝大多数书画作品已散佚有关,不过与总量相比,这个数字仍然过少。

由于元帝出逃仓促,明军攻入大都时元内府所藏基本保存完好,徐达将元代秘书监所藏典籍、书画悉数运回南京。洪武时期,内府所藏法书、名画大都汇聚到纪察司,钤有明初“纪察司印”半印的存世法书、名画尚有 140

^①佚名编:《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典章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 263 册,齐鲁书社,1996 年,第 309 页。

^②王士点、商企翁:《秘书监志》卷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596 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年,第 807—808 页。

^③王士点、商企翁:《秘书监志》卷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596 册,第 809 页。按,名画立轴和手卷相加为 1526 件,并非 1556 件,数字应有错讹。

件以上^①,虽然其中也存在有伪印的情况,但总数不下百件并无问题,如算上见于文献著录的,数量就更多了。元内府与明初洪武内府所藏有很大的关联性,时间也十分接近,那么按常理而言不应出现钤有所谓元内府或秘书监“都省书画之印”的作品远少于钤有洪武内府“纪察司印”的情况。

第三,存世的元以前书画,凡是明确记载曾收藏于元代秘书监的,没有一件钤有“都省书画之印”。元人王恽曾记录了一部分他所看到的元代秘书监所藏书画,均系从杭州运到大都的原南宋内府藏品,共二百多件^②,据杨仁恺统计,其中法书 147 件,名画 81 件^③。这里面不少作品流传至今,如孙过庭《书谱》(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怀素《自叙帖》(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阎立本《历代帝王图》(波士顿美术馆藏)、黄庭坚《廉颇蔺相如传》(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黄庭坚《行书赠张大同卷》(普林斯顿大学博物馆藏)等,但这些曾由元秘书监收藏的书画却没有一件钤有“都省书画之印”,这也不能不令人生疑。

第四,钤有“都省书画之印”的实物,包括了刻本书籍、法书墨迹、碑刻拓本、绘画册页,却没有一件绘画立轴,仅有的几件绘画手卷也大都存在可疑之处(说详下文),这与元《秘书监志》记载秘书监书画收藏中包括大量绘画立轴和绘画手卷的情形形成明显的反差。前引《秘书监志》至正二年的统计,绘画手卷和立轴为“一千五百五十六”件,其数量是法书的三倍以上,册页装订成的“看册”仅有“七帙”。那么,被认为与元代秘书监收藏相关的“都省书画之印”竟然基本不钤盖于占藏品主要部分的绘画立轴和手卷上,于情理不合。

第五,检索文献著录,钤有“都省书画之印”的作品最晚有元末王蒙的《松路仙岩图》,此图几无可能入藏元秘书监或元内府。清人安岐《墨缘汇观录》著录此图,谓:

绢本长方幅,高一尺一寸六分,阔八寸五分,淡着色山水。此图山重水复,松路幽深,其楼观、山村、渔舟、客艇皆具工细。图左首题“松路仙岩”四字,后书“黄鹤山人王蒙为唐卿制”,楷法甚工。上半钤朱文“都省书画之印”,后下角钤一朱文长条印,惟存边痕。画左

①赵晶:《明代画院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65页。

②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九四,《四部丛刊》第1397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年,叶十一。

③杨仁恺主编:《中国书画》,第377页。

有“张则之”“季雅”二朱文印。上藏经纸董文敏行楷题云：“此钤山堂藏画也，余得之娄水周将军。盖是山樵仿燕文贵笔，盈尺间有千岩万壑，林木郁茂，楼阁缥缈，当命之《仙山图》。其昌。”下押“董其昌”白文印，后押白文“张孝思赏鉴印”“张则之”朱文印。^①

此图与赵孟頫东西洞庭二图、巨然《江山晚兴图》、范宽《江山萧寺图》等在一册中，后入乾隆内府，《石渠宝笈》著录^②。目前册中仅有赵孟頫东西洞庭二图中的《洞庭东山图》尚存世，今藏上海博物馆，其他各图未见当代著录或博物馆收藏，似已亡佚。该册中巨然《江山晚兴图》和王蒙《松路仙岩图》均钤有“都省书画之印”。王蒙之图虽未见实物，真伪不能直接判断，不过此图经清代鉴藏大家安岐收藏，并经《墨缘汇观录》著录，以安氏鉴藏之精，其可靠性应有一定保障。从著录的鉴藏印看，安岐应得之于张孝思或其后人。张孝思字则之，号懒逸，江苏丹徒人，是明末清初的



图2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贾师古《岩关古寺图》

著名收藏家，精于鉴赏。其父张觐宸，亦精鉴赏，与董其昌关系密切，董其昌在万历四十四年（1616）的“民抄董宦”事件中一度逃离松江避难，张家是其暂居地之一。此图应是从董其昌处流转至张孝思或张觐宸，再至安岐处。另外，《墨缘汇观录》特别提到该图下角“钤一朱文长条印，惟存边痕”，此长条印应当就是与“都省书画之印”常常同时出现的“礼部评验书画关防”印。

此印通常出现在绘画册页中“都省书画之印”的正下方或对角下方，往往半钤，仅留边条。如存世贾师古《岩关古寺图》（见图2）、佚名《白眉翠禽图》（克里夫兰美术馆藏）等，该印的出现更增加了王蒙此图的可靠性。

①安岐：《墨缘汇观录》卷四，《续修四库全书》第106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40页。

②张照等编：《石渠宝笈》卷四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25册，第582—583页。

王蒙生年虽然有 1298、1301、1308 等多种说法^①,但无论按照哪一说,入明时都已年过六旬,其大半生是在元代度过,理论上六十岁之前的作品还是存在被收入元代宫廷的可能,特别是其青壮年时期的作品,但实际上这种可能性又可谓微乎其微。元末四大家真正获得全国性的影响,并受到收藏界的普遍追捧是在明代中期以后,与吴门画派的兴起密不可分。在元代,他们与宫廷并没有发生直接的联系,也未得到社会上层的普遍推崇,因此宫廷基本不可能主动去收藏当时江南下层官吏或在野文人画家的作品。

具体到《松路仙岩图》,其被收入元代内府的可能性就更小了。此图是王蒙为“唐卿”而作,元人字“唐卿”者有两人相对知名,一是华祖立,系职业画家,活动于元代中前期,相关记载极少,籍贯、生卒年均不明,泰定三年(1326)作《玄门十子图》,今藏上海博物馆,是其唯一存世作品。此人与王蒙并无相关往来记载,主要活动时代亦有差距。另一位是元末明初文人余尧臣,余氏在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万斯同《明史稿》、《明史》中均有传,《列朝诗集小传》谓:

尧臣,字唐卿,永嘉人。早以文学著。客居会稽。越镇帅院判迈善卿、参政吕珍罗致幕下,与有保越之功,荐剡交上,无意仕进,于越之桐桂里治圃结茅,署曰“菜薹”。已而,入吴,居北郭,与高启、张羽为北郭十友,即所谓十才子也。启《送唐肃序》曰:“余世居吴北郭,同里交善者,惟王止仲一人。十余年来,徐幼文自毗陵、高士敏自河南、唐处敬自会稽、余唐卿自永嘉、张来仪自浔阳,各以故来居吴,而皆与余邻。于是北郭之文物遂盛矣。”羽《续怀友诗序》曰:“予在吴城围中,与余唐卿诸君游,皆落魄不任事,故得留连诗酒。”吴亡之后,与杨基、徐贲同被征谪濠。洪武二年放还,授新郑丞。此见于高启答诗者也。曰司马,又曰左司,必东越镇将版授之职衔,而今不可考矣。^②

^①关于王蒙生年,朱铸禹《中国历代画家人名辞典》作 1298 年(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 年,“元明清”部分第 87 页),俞剑华《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作 1308 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123 页),温肇桐《元季四大画家》作 1301 年(世界书局,1945 年,第 23 页)。

^②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甲前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第 59—60 页。

余氏元末曾为温州路儒学学录^①,后入张士诚政权为左司,是以高启为核心的苏州“北郭十友”诗人群体的成员,其墨迹见于朱德润《秀野轩图》卷后题诗。在张氏政权覆亡前的这几年中,王蒙曾在张士诚政权中担任长史一职^②,大约在苏州被围前不久才离开,与余尧臣可算同僚。王蒙与元末苏州地区的文人往来十分密切,参加过多次文人、官僚的雅集活动,不少重要的作品均作于此时^③。“北郭十友”中,高启、徐贲、杨基、张雨、陈则等人均有与王蒙来往的直接记载,他们也大多任职于张士诚政权中。因此,《松路仙岩图》中的“唐卿”应是元末苏州“北郭十友”之一的余尧臣,此图的创作时间当在至正末年张士诚政权覆灭前夕。

苏州城破后,余尧臣作为被俘的张氏政权人员先是被押送南京,后被流徙至凤阳,遇赦后加入明政权,出任新郑县丞,洪武间官至浙江按察使^④。考虑到苏州城破已是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九月,第二年元朝覆亡,余氏所藏的这件《松路仙岩图》基本可以排除进入元代内府的可能,相反倒很可能是作为张氏政权谪戍官员的财产被籍没入朱元璋内府。

二、“都省书画之印”是明代中书省的官印

“都省书画之印”作为元代秘书监或元代中书省之印存在诸多疑点,特别是此印出现在元末画家王蒙为元末明初文人余尧臣所绘画作上,故该印应非元代秘书监或其他元代机构官印。实际上,印文中的“都省”的确是指中书省,但并非元代中书省,而是明初中书省,此印应是明初中书省官印,使用该印的应当是明初中书省或其下辖机构,其使用时间的上限不超过至正二十四年(1364),下限是洪武十三年(1380),之后不再使用。理由有以下几点:

第一,明初一度设中书省,存在“都省”的建制。明代中书省的前身是至正十六年(1356)朱元璋攻克集庆后设置的江南行中书省,随着攻占区域的扩大,各地增设行省。据《明太祖实录》,是年七月,“诸将奉上为

①刘方誉、林继衡等修,王光蕴等纂:《〔万历〕温州府志》卷八,明万历刻本,叶四。

②陈基:《夷白斋稿》卷九《寄周信甫王叔明二长史》,《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2册,第223页。

③张光宾:《王蒙研究·王蒙年表》,上海书画出版社,2006年,第302—303页。

④邓富华:《元末明初“北郭十友”之余尧臣考辨》,《中国文学研究》2013年第3期,第46页。

吴国公,以元御史台为公府,置江南行中书省”^①。十八年十二月又在婺州设分省,并调中书省官员前往任职^②,这个分省应当是江南行中书省的分省^③。至正二十四年,朱元璋即吴王位,建百司官署,设中书省左、右相国^④,当从此年开始将原江南行中书省正式升格为中书省^⑤。洪武元年(1368)八月又在中书省下正式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⑥。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后,朱元璋废除中书省,不再设中书省左、右丞相,中书省下辖的六部直接向皇帝负责,此为政治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标志着宰相制度的终结。不算江南行中书省阶段,明代中书省如从至正二十四年起计算,共存续十六年,如仅从洪武元年计算,其存续亦有十二年。

第二,明初也称中书省为“都省”。如洪武元年颁行的《大明令》载:“凡府州县长官到任,须要将交割前官应有户口田粮总数,先申上司,转达都省,以凭考验。”^⑦成书于洪武三年的《大明集礼》谓:“正旦、圣节,在内省院台长官,进表称贺,在外行中书省亦然,其所属五品以上,第进所属上司,类进都省。各万户府进枢密院,廉访司进御史台,亦类进焉。”^⑧“次日至都督府参拜,都督府官坐府堂上,各卫官属戎服,盛陈兵仗,其陈设参见仪如都省,及参见经历司如都省左右司之仪。”^⑨

第三,明初中书省有管理画家及保管书画的职能。至正二十四年,朱元璋即吴王位,“命中书省绘塑功臣像于卞壺及蒋子文庙,以时遣官致祭”^⑩。另据《无声诗史》记载:“洪武中征画史集中书,令图往贤著功名

①《明太祖实录》卷四,丙申七月己卯,“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45页。

②《明太祖实录》卷六,戊戌十二月丙戌,第73页。

③俞本撰,李新峰笺证:《纪事录笺证》卷上,中华书局,2015年,第101页。

④《明太祖实录》卷十四,甲辰正月丙寅,第175页。

⑤王世贞撰,魏连科点校:《弇山堂别集》卷四七《六部尚书表》,中华书局,1985年,第880页。

⑥《明太祖实录》卷三四,洪武元年八月丁丑,第609页。

⑦张卤辑:《皇明制书》卷一,《续修四库全书》第78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页。

⑧徐一夔等纂修:《大明集礼》卷十七《嘉礼一》,国家图书馆藏明嘉靖九年(1530)内府刻本(索书号:04471),叶十九至二十。

⑨徐一夔等纂修:《大明集礼》卷三一《宾礼二》,叶二十九。

⑩《明太祖实录》卷十五,甲辰九月辛巳,第203页。

者,(赵)原应对忤旨,见法。”^①明初宫廷画家赵原即隶属中书省。

明代中书省的建制继承自元代,元中书省有专门的“架阁库”存放相应图书或档案资料^②,明初中书省当也存在类似的机构,用于保管画家的创作以及统一战争中获取的典籍、书画等。另外,明初中书省下辖的礼部有专门的书画库,用于书画的保管。礼部书画库建立的准确时间不明,但其正式设置官职是在洪武八年二月,《明太祖实录》载:“置书画库官一人,正九品,隶礼部。”^③

礼部书画库的前身很可能就是中书省保管书画的仓库,洪武元年中书省正式设置礼部后,书画保管职能当归属于礼部。礼部书画库于洪武十三年正月撤销,这与秘书监及中书省的废止在同一年,事见《明太祖实录》洪武十三年正月癸丑条:“罢礼部备用库、书画库、凤阳行工部营造提举分司、储用库、盐运司纲官、押运。”^④

第四,从前述王蒙《松岩仙路图》看,此图在苏州城破后作为战利品或抄家物资进入朱元璋西吴政权,随后成为明内府的收藏。其上“都省书画之印”中的“都省”应是指朱元璋政权的中书省,而非元中书省。

第五,从黄易旧藏《范式碑》拓本的钤印情况看,其上的“都省书画之印”也更可能是明代官印。《范式碑》拓本是黄易旧藏《汉魏五碑》之一,黄易题此本云:

右庐江太守范式碑,与凉州刺史魏元丕碑共装一册,签题曰“汉碑十”。相国泰安赵公所藏。乾隆癸卯夏,王古愚得于济南,割爱见贻,装为二。寄都门翁官詹覃溪题跋。乙巳五月,知胶州张荫堂从聂剑光处得灵台、朱龟、譙敏三碑赠易。晴窗展对,与范、魏二碑装池同出一手,修短悉符,延津剑合,不胜狂喜。因共为一函,题曰“汉魏五碑”。

案:元天历间幽州梁有九思奉敕历山东、河北拓金石文字三万通汇进,类其副二百卷,题曰“文海英澜”。此碑有元内府“都省书画之印”“济南府印”,或即九思所进,未可知也。唐李嗣真以此碑为蔡中郎书。吴念湖以郑氏《通志》所载一庐江太守范式碑,注云“蔡邕书,

①姜绍书辑:《无声诗史》卷一,于安澜编:《画史丛书》,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年,第6页。

②王士点、商企翁:《秘书监志》卷五,《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96册,第800页。

③《明太祖实录》卷九七,洪武八年二月癸丑,第1666页。

④《明太祖实录》卷一二九,第2056页。

济州”；一魏范式碑，注云“有碑阴，青龙三年”。是范式实有汉魏两碑，李嗣真所指乃蔡邕一碑也。此碑洪《释》五百二十七字，拓本只存三百四十八字。原石久失。崔墨云初得碑额片石，李铁桥继得断碑，有碑阴，俱立于济宁学官戟门下。宋拓本校新出断碑多一百八十余字，实海内希有之迹，亟双钩付梓，以公同好。乾隆己酉十一月钱唐黄易识于济宁官舍。^①

此本有“都省书画之印”及“济南府印”，故黄氏疑此本为元代天历间由济南地方通过柯九思进呈元内府。其中的“济南府印”，宽边，印文为九叠篆，其形制与多系窄边的宋金官印有明显区别，接近于元明时期官印。但将此印定为元印恐不妥，一方面，汉文官印通行于元代早期，中后期主要用八思巴文官印。另一方面，元代地方建制为四级，即行省、路、州（府）、县，济南在元代为路一级建制，设总管府，长官为达鲁花赤和总管，元初赵孟頫即曾任济南路总管，在此期间创作了著名的《鹊华秋色图》。济南路的官印为八思巴文的“济南路总管府印”，元代三十三府中并无济南府，故此“济南府印”应非元代所有，而系明代济南府官印，此拓本更可能是明初济南府收集或捶拓后呈送中书省的。由此来看，该拓本之年代是否到宋亦存疑，不排除为元代或明初拓本。值得注意的是，《范式碑》在南宋洪适《隶释》著录时尚存 527 字，而此本仅存 348 字，其缺字超过三分之一，前引翁方纲跋也注意到此本字数要少于洪适著录的字数，故除非洪氏著录时找到了远早于南宋时期的唐代拓本，否则此本作为“宋拓”字数过少，似损泐过甚。

第六，存世钤有“都省书画之印”的古籍、绘画册页及法书墨迹中，绝大多数同时钤有“礼部评验书画关防”一印，显示出两印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应是同一时期所钤，而后者是明代官印。“礼部评验书画关防”通常被认为是明初官印，笔者曾指出此印很可能就是明初礼部书画库的官印^②，那么“都省书画之印”应当也是同时期的明初官印，而非元印。此前，两方印章同时出现的现象往往被用来解释元明内府之间的递藏关系，但这一解释存在疑点。

^①故宫博物院藏黄易旧藏《范式碑》拓本。缺字参校黄易辑：《小蓬莱阁金石文字》，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9 年，第 327—328 页。

^②赵晶：《明代宫廷书画收藏考略》，《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3 期，第 165 页。

“礼部评验书画关防”印集中出现在钤有“都省书画之印”的书画或书籍上,表明两印很可能是同时所钤,或至少也是由关系密切的机构在相隔较短的时期内分别钤盖上去的,这需要相互配合才能完成。两个不同朝代的不同机构基本上不存在互相“协作”的可能性,即明代内府或礼部不可能从接收的大量元内府收藏中只挑选那些已经被元内府钤盖了“都省书画之印”的作品再钤印。所以,出现这一现象只能用二印同处于一个时期,且钤印机构关系紧密来解释。

李万康曾统计存世典籍、书画中有“礼部评验书画关防”一印的作品,注意到此印与“都省书画之印”的关联性,认为“礼部评验书画关防”和“都省书画之印”一样也是元代官印,而非通常所认为的明代官印^①。不过,这一结论的成立至少需要两个前提条件,一是“都省书画之印”被确证是元代官印。但正如本文所述,此点尚存疑。二是需要将关防印的出现至少上推至元代,而通常认为关防印自明代才出现。李氏虽然对“礼部评验书画关防”印作了较长篇幅的论证,但始终未能举出一件可靠的明代以前关防印的实物。不过他指出,清人吴騫《拜经楼藏书题跋记》、叶德辉《书林清话》都提到在宋本《王状元集诸家分类东坡先生诗集》中钤有一枚“庆元路提学副使邵晒理书籍关防”印,并认为这表明元代已经出现了关防印^②。因此,对这枚仅见于文献记载的所谓的元代关防印有必要作进一步的辨析。

此印中出现了“提学副使”的官职,考元代官制,司天监下有提学二员,从九品,但此职属于京职,并不在地方上,也与教育无关。另外,《元史·许衡传》中提到金末元初的许衡曾被召为“京兆提学”^③,同书《敬俨传》提到敬铉在蒙古统治中原之初曾担任过“中都提学”^④,《宋子贞传》还提到李璫之乱后,元廷根据宋子贞的建议敕“州郡提学”课试诸生,三

①详参李万康相关论文,如《半印关防:元代秘书监书画庋藏关防考》,《中国美术研究》2017年第2期,第113—118页;《图像证据的证明、诠释与甄别:“礼部评验书画关防”印考》,《形象史学》2018年第2期,第26—54页;《温字编号考——兼论元秘书监图籍庋藏关防与收储流程》,《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2018年第2期,第66—72页。

②李万康:《图像证据的证明、诠释与甄别:“礼部评验书画关防”印考》,《形象史学》2018年第2期,第32页。

③宋濂:《元史》卷一五八,中华书局,1976年,第3717页。

④宋濂:《元史》卷一七五,第4096页。

年一贡举^①。不过这些职务都出现在忽必烈正式建立元朝之前的大蒙古国时期,南方尚未统一,且并不存在“副使”或“使”。元朝建立后在各行省设置儒学提举司,“统诸路、府、州、县学校祭祀教养钱粮之事,及考校呈进著述文字”^②。设有提举一员,从五品;副提举一员,从七品。另外在路、府、州、县学官有教授、学正、学录等,但并无“提学副使”一职,且正、副提举也不设于路一级,其他元代史料中也未发现有“提学副使”一职。

“提学副使”是典型的明代官职,正统以后才出现。明代地方上以按察司副使或佥事提调学校,称提学副使或提学佥事。起先该职并无关防印信,正德十年(1515)后始颁给提学衙门关防、印信^③。李万康认为“庆元路提学副使邵晒理书籍关防”系元印,应与此印中出现了元代才有的“庆元路”建制有关,不过不能仅凭这一点就认为该印系元印,因为也存在沿用古称乃至有意作伪的可能。该印与《卧宋楼藏书志》卷二五、《善本书室藏书志》卷三九以及《王文敏公遗集》卷五提到的“隆庆壬申夏提学副使邵晒理书籍关防”印十分接近,两印应存在一定联系^④。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载:

右《诗林广记》,只存后集,有“钤山堂图书印”,又有“隆庆壬申夏提学副使邵晒理书籍关防”朱记。按,《钤山堂书画记》隆庆戊辰茂苑文嘉跋云:“嘉靖乙丑五月,提学宾涯何公机檄余往阅官籍严氏书画,三阅月始毕事。”又,《天水冰山录》所记经史文集等书八十八部,大率宋版明刻,不列细目,其应发各儒学收贮书籍计五千八百五十二部套,此十卷当在其中者。壬申为隆庆六年,上距嘉靖乙丑十七年,晒理此书必归之儒学之后,故官为掌之。《江西通志·按察司副使表》隆庆间有邵公孟麟,滁州进士,殆即其人。流传三百余年,展卷若有余腥,而以之昭炯鉴,供品评,亦犹悦生堂书画钤有葫芦小印耳。^⑤

丁丙认为“隆庆壬申夏提学副使邵晒理书籍关防”可能是明代曾任江西

①宋濂:《元史》卷一五九,第3737页。

②宋濂:《元史》卷九一,第2312页。

③俞汝楫编:《礼部志稿》卷七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98册,第181页。

④李万康举出《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补编、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三记载了此印,但认为“这枚明代关防印有仿刻之嫌,真伪存疑”(李万康:《图像证据的证明、诠释与甄别:“礼部评验书画关防”印考》,《形象史学》2018年第2期,第33页)。

⑤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卷三九,《续修四库全书》第927册,第662页。

按察司副使的邵孟麟之印。邵孟麟,一作邵梦麟,嘉靖己未(1559)进士,梦麟有兄为梦珠^①,可知其名当为梦麟。过庭训《本朝分省人物考》中有邵梦麟小传:

邵梦麟,滁州人,七岁授书里塾,每至闵子、比干章,辄潜然流涕。常书其座云:“士君子立身当忠孝廉介,庶不忝乎所生。”登嘉靖己未进士,初授大理评事,扶继母柩归,舟沉枣林闸,涉水扶衬,几为所溺。金宪河南,清屯田数万顷,置两驿以苏民困。参议浙江,剔蠹厘奸,贪墨解绶。倭寇温、处,亲督兵御之,生擒倭酋马打一等。督学江右,加意行检,文崇典雅,一切请托不行。改山东参政,抵任七日而卒,囊橐罄然,无以为殓。^②

“督学江右”,即担任江西提学副使。徐学谟《江西乡试录序》亦称之为“提学副使邵梦麟”^③。《〔光绪〕江西通志》将邵氏任按察副使的时间放在隆庆四年(1570)任副使的徐学谟之后^④,说明他是此后到任的。而据《明穆宗实录》,隆庆四年四月,“调浙江布政使司参议邵梦麟于河南”^⑤;隆庆四年十二月,“升河南布政司左参议邵梦麟为浙江按察司副使,提调学校”^⑥,抱经楼本《明穆宗实录》此条作“升河南布政司左参议邵梦麟为浙江提学副使”^⑦。可证邵氏任职江西必在隆庆五年之后,隆庆六年(壬申)任江西提学副使前还曾任浙江提学副使,故“隆庆壬申夏提学副使邵晒理书籍关防”确系邵梦麟之印。

明代以按察司副使、佥事分巡省内各道,邵氏虽有任职浙江提学副使的经历,但明代浙江并无“庆元路”的建制,庆元路在明代称宁波府,属于宁绍道,所谓的“庆元路提学副使邵晒理书籍关防”印混用元明制度,很可能是清代书贾根据“隆庆壬申夏提学副使邵晒理书籍关防”制作的伪

① 龚延明主编,毛晓阳点校:《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登科录》下,宁波出版社,2016年,第257页。

② 过庭训:《本朝分省人物考》卷四一,《续修四库全书》第534册,第104页。

③ 徐学谟:《徐氏海隅集》文编卷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24册,齐鲁书社,1997年,第451页。

④ 曾国藩、刘坤一等修、刘绎、赵之谦等纂:《〔光绪〕江西通志》卷十三《职官表》,《续修四库全书》第656册,第312页。

⑤ 《明穆宗实录》卷四四,隆庆四年四月乙巳,第1104—1105页。

⑥ 《明穆宗实录》卷五二,隆庆四年十二月甲午,第1291页。

⑦ 黄彰健:《明穆宗实录校勘记》,“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452页。

印,而不是相反。所以不能仅凭“庆元路提学副使邵晒理书籍关防”这一方带有很大伪印嫌疑的孤例,就认为元代已出现了关防印。

三、“都省书画之印”的使用特点

从存世钤有“都省书画之印”的书籍、书画实物,以及文献记载的“都省书画之印”的使用情况看,存在以下特点:

第一,“都省书画之印”主要钤于书籍刻本、法书墨迹、碑帖拓本以及绘画册页上,极少数绘画手卷或立轴上亦有此印,但多有疑问。钤有“都省书画之印”的书画、书籍实物以及见于文献记载的数量并不多,此前傅申、李万康等多位学者均有统计,其中傅申统计了 11 件^①,李万康又补充了约 21 件^②,结合笔者目验所得,目前统计到存世及见于著录的共有 32 件,其中部分书画作品系伪迹或真伪存疑,故其上所钤之“都省书画之印”亦不真或存疑,详见下表 1:

表 1 钤有“都省书画之印”的书画、书籍一览

序号	类别	名称	藏地或出处	备注
1	绘画·册页	北宋崔恣《杞实鹌鹑图》	台北故宫博物院	有“礼部评验书画关防”
2	绘画·册页	南宋萧照《秋山红树图》	辽宁省博物馆	有“礼部评验书画关防”
3	绘画·册页	南宋贾师古 《岩关古寺图》	台北故宫博物院	有“礼部评验书画关防”及“司印”
4	绘画·册页	南宋李迪《猎犬图》	故宫博物院	有“礼部评验书画关防”及“司印”
5	绘画·册页	南宋吴炳《竹雀图》	上海博物馆	有“礼部评验书画关防”
6	绘画·册页	南宋马麟《春郊回雁图》	克利夫兰博物馆	有“礼部评验书画关防”及“司印”
7	绘画·册页	南宋李迪(传) 《古木竹石图》	波士顿美术馆	

①傅申:《元代皇室书画收藏史略》,第 93—95 页。
②李万康:《图像证据的证明、诠释与甄别:“礼部评验书画关防”印考》,《形象史学》2018 年第 2 期,第 31、38、48、51 页。

续表

序号	类别	名称	藏地或出处	备注
8	绘画·册页	南宋佚名《渔乐图》	故宫博物院	有“礼部评验书画关防”
9	绘画·册页	南宋佚名《白梅翠禽图》	克利夫兰博物馆	
10	绘画·册页	南宋佚名《牡丹图》	私人	有“礼部评验书画关防”
11	绘画·册页	元佚名(旧传唐曹元廊) 《山水图页》	弗利尔博物馆	有“礼部评验书画关防”
12	绘画·册页	南宋刘松年 《天女散花图》	台北故宫博物院	“都省书画之印”有移配痕迹
13	绘画·册页	五代巨然《江山晚兴图》	《墨缘汇观》 卷四	原图已佚,有“礼部评验书画关防”
14	绘画·册页	南宋刘松年 《风雨归庄图》	《式古堂书画 汇考》画卷三	原图已佚,有“礼部评验书画关防”
15	绘画·册页	南宋马远《观泉图》	《式古堂书画 汇考》画卷三	原图已佚,有“礼部评验书画关防”
16	绘画·册页	元王蒙《松路仙岩图》	《墨缘汇观》 卷四	原图已佚,有“礼部评验书画关防”
17	绘画·手卷	唐周昉《麟趾图》	台北故宫博物院	图系明清人伪作,印当为伪
18	绘画·手卷	北宋郭熙《关山晓行图》	故宫博物院	画不真,“都省书画之印”疑伪
19	绘画·手卷	南宋佚名《揭钵图》	故宫博物院	“都省书画之印”存疑 ^①
20	绘画·手卷	南宋谢元《折枝碧桃》	私人	“都省书画之印”存疑;有“礼部评验书画关防”,亦存疑 ^②

①有研究者认为此图中的“都省书画之印”存疑,参见王中旭:《元代〈揭钵图〉的两种类型与真伪考辨——基于佛画转型视野下的考察》,《故宫博物院院刊》2022年第6期,第86页。

②有研究者认为卷上的“礼部评验书画关防”有疑伪之嫌,参见李万康:《图像证据的证明、诠释与甄别:“礼部评验书画关防”印考》,《形象史学》2018年第2期,第42—43页。图上的“都省书画之印”是否可靠亦有待进一步研究。

续表

序号	类别	名称	藏地或出处	备注
21	绘画·手卷	元佚名《十八公图》	故宫博物院	系冯子振《十八公赋》书法手卷的配图,书法部分民国间佚失,迄未发现 ^①
22	绘画·手卷	元王振鹏《墨幻角抵图》	《江村销夏录》卷一	原图已佚,图、印真伪情况不明 ^②
23	绘画·立轴	南宋林椿《十全报喜图》	台北故宫博物院	图系明人之作,“都省书画之印”当为伪 ^③
24	绘画·立轴 (双幅)	元李衍《墨竹图》	《江村销夏录》卷二	原图已佚,有“礼部评验书画关防” ^④
25	书法·手卷	元鲜于枢 《草书杜甫魏将军歌诗》	故宫博物院	有“礼部评验书画关防”及“司印”
26	书法·手卷	元赵孟頫(传) 《临褚摹兰亭序卷》	私人	有“礼部评验书画关防”

①此图原系元代冯子振《十八公赋》前面的配图,冯赋原文长达五千余字,《墨缘汇观录》著录时尚称“冯子振十八公赋曹知白补图卷”(安岐:《墨缘汇观录》卷三,《续修四库全书》第1067册,第308页)。此图另有元人赵岩、邓文原等题跋,并钤“皇姊图书”印。此卷后入清乾隆内府,溥仪携出宫后佚去了冯子振《十八公赋》及元人题跋,仅留该配图。徐邦达指出,图中的“曹知白画”系后添,根据冯赋,原作者当为“方外卢生”,图中还应画有“驿亭沙塞荒寒寥落之状”,却不见于现存图中,故此图可能并非卢画原物,但“皇姊”“都省”等元印俱真,颇难理解(徐邦达:《古书画伪讹考辨》下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61页)。此卷情况复杂,有待进一步研究,如“都省书画之印”为真,由于画为冯赋的配图,有可能是作为书法类作品而不是绘画手卷而钤“都省书画之印”的。另外还存在一种可能,即该卷最初可能是采用册页的装帧形式。

②此图另有“皇姊图书”印,有冯子振、赵岩、袁桷、张圭、邓文原、柯九思等十余人题跋,详参高士奇撰,邵彦校点:《江村销夏录(江村书画目附)》卷一,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47页。

③傅申:《元代皇室书画收藏史略》,第95页。

④此图据著录为“双幅绢本,长四尺五寸,阔三尺一寸”(高士奇撰,邵彦校点:《江村销夏录(江村书画目附)》卷二,第100页)。推测可能是两幅立轴,由于原图已佚,图、印真伪情况不明。

续表

序号	类别	名称	藏地或出处	备注
27	书法·册页	元赵孟頫(传) 《书前后赤壁赋册》	台北故宫博物院	有“礼部评验书画关防”
28	碑刻拓本	三国《范式碑》拓本	故宫博物院	有“济南府印”
29	书籍	南宋刻本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	国家图书馆	有“礼部评验书画关防”
30	书籍	元刻本戴侗《六书故》	台北故宫博物院	有“礼部评验书画关防”
31	书籍	元刻本《资治通鉴》	国家图书馆	有“礼部评验书画关防”
32	书籍	元刻本《新编古今事文类聚》	台北故宫博物院	有“礼部评验书画关防”

从上表可见,除了书法手卷、碑刻拓本及古籍刻本外,绘画作品中钤有“都省书画之印”的主要集中于绘画册页中,占到三分之二。仅有六件绘画手卷和两件绘画立轴钤有此印,不过这八件作品或已佚无法判断,或是伪迹,或钤印存在一些问题。

为什么“都省书画之印”会呈现多见于书籍、法书碑帖和绘画册页,而罕见于绘画卷轴这一特点呢?笔者推测这应当与钤印机构选择的藏品范围相关。该机构的收藏以书籍、法书墨迹和碑刻拓本为主,绘画则以册页为主,较少涉及立轴及手卷。从这一特点看,并不符合元代秘书监的收藏情况。如“都省书画之印”所钤对象为元代秘书监藏品,就不应呈现占其绘画藏品大多数的手卷和立轴反而罕见此印的现象。

第二,此印常伴随有“礼部评验书画关防”一印。从较可靠的同时钤有“都省书画之印”和“礼部评验书画关防”二印的绘画册页来看,“都省书画之印”一般位于左上角或右上角,钤印时如左右上角均空白,那么通常优先钤于右上角,如贾师古《岩关古寺图》及马麟《春郊回雁图》(见图3)。当右上角有文字或画面遮挡时则钤于左上角,如李迪《猎犬图》(见图4)及佚名《白梅翠禽图》(见图5)。“礼部评验书画关防”通常位于册页的下部,钤于左下角或右下角,在册页中均为半钤,有时与“都省书画之印”呈现对角布置,有时又与其在同侧。在上下方位上通常保持处于“都省书画之印”的下方,符合礼部隶属于都省的层级关系。与“都省书画之印”优先钤于右上角不同,“礼部评验书画关防”在左侧或右侧

似无特别优先的顺序。存世作品中,《白梅翠禽图》左右下角均空白,此印钤于右下角。崔恣《杞实鹌鹑图》左右下角均有少许画面的遮挡,却钤印于左下角。



图3 克里夫兰博物馆藏
马麟《春郊回雁图》



图4 故宫博物院藏
李迪《猎犬图》



图5 克里夫兰博物馆藏佚名《白梅翠禽图》

从存世的两件书法手卷赵孟頫(传)《临褚摹兰亭序卷》(见图6)、鲜于枢《草书杜甫魏将军歌诗》(见图7)看,“都省书画之印”钤于卷首上部,“礼部评验书画关防”则钤于卷首下部。在书法册页上,如赵孟頫(传)《书前后赤壁赋册》(见图8)“都省书画之印”钤于首开,“礼部评验书画关防”则位于末开,这与二印在书籍中钤印体例完全相同,两者应该被归于同一类。又如国家图书馆藏元魏天祐刻本《资治通鉴》(图见

封二)及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元刻本戴侗《六书故》,也都是“都省书画之印”位于该册首叶,“礼部评验书画关防”在该册末叶。既然已通过前后秩序确定了中书省和礼部地位的高下,故钐于首开的“都省书画之印”无需刻意钐于页面的上方,而是均位于下方空白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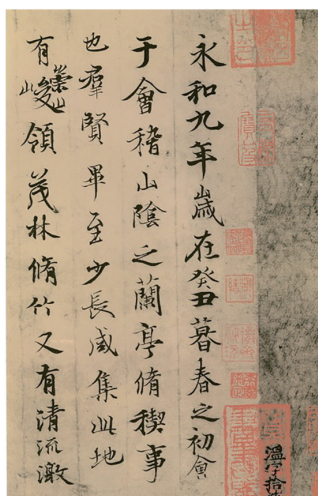


图6 私人藏赵孟頫(传)
《临褚摹兰亭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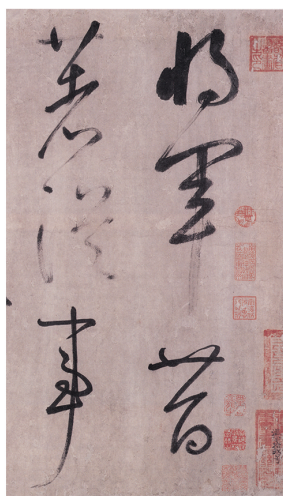


图7 故宫博物院藏鲜于枢
《草书杜甫魏将军歌诗》



图8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赵孟頫(传)《书前后赤壁赋册》首开(右)
及末开(左)

四、“都省书画之印”钤印物品在明初官方机构的流转情况

“都省书画之印”往往与“礼部评验书画关防”同时使用,古籍、书画上钤有二印可能与明初所设立的大本堂或秘书监有关。明初设大本堂,“取古今图书充其中,延四方名儒教太子、诸王,分番夜直,选才俊之士充伴读”^①,设立时间不晚于洪武元年十一月。由于需要调拨中书省所藏图书到大本堂,在挑选过程中存在钤此二印的可能。

明初承元制,亦设秘书监。明代秘书监设于洪武三年三月,秩正六品^②,包括监令一人,监丞二人,直长二人,职掌内府书籍,即“秘书”^③。除保管书籍外,秘书监还有刊刻书籍的职能,洪武三年十二月,《大明志》修成,即“命送秘书监镌梓颁行”^④。除了保管和刊刻书籍,秘书监也收藏有历代法书名帖,宋濂《题霜寒帖后》记载:

濂授经青宫时,皇太子欲学书,召秘书丞陶宗儒至殿下,下教曰:“晋人法书,选真迹之佳者以进。”宗儒奉教而退。于是用彩龙黄帕裹二十轴来上……其一乃献之《鹅群帖》,却绝佳……濂请留《鹅群帖》,而以其余还宗儒。^⑤

太子朱标学习书法时由秘书监官员提供晋人法书墨迹,可知明代秘书监除了收藏书籍外也收藏历代书法作品。因宋濂的建议,《鹅群帖》留在大本堂,明初苏伯衡在《跋保母帖卷后》谓:“今大本堂有《鹅群帖》,大令真迹也。”^⑥秘书监于洪武十三年七月被撤销,共存续十年,撤销原因是其职掌与翰林院重叠。《明太祖实录》洪武十三年七月癸巳载:“吏部言,旧制秘书监令一人,丞二人,直长二人,以掌秘书。今内府书籍已有翰林院典籍掌之,其秘书监令、丞诚为虚设,宜罢。从之。”^⑦秘书监撤销后,其所藏

①《明太祖实录》卷三六上,洪武元年十一月辛丑,第665页。

②《明太祖实录》卷五十,洪武三年三月庚子,第978页。

③《明太祖实录》卷一三二,洪武十三年七月癸巳,第2101页。

④《明太祖实录》卷五九,洪武三年十二月辛酉,第1149页。

⑤宋濂著,黄灵庚编辑校点:《宋濂全集》卷三六,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794页。

⑥苏伯衡:《苏平仲文集》卷十,《四部丛刊》第1535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年,叶二十。

⑦《明太祖实录》卷一三二,第2101页。

内府书籍应归翰林院保管。

从上述明初史料可知,明初秘书监主要职能即收藏“秘书”,同时也刻印书籍。“书”是就其广义而言,包括了版刻书籍和书法墨迹,但未见有收藏绘画手卷及立轴的记载,这与存世钤有“都省书画之印”的实物情况比较接近。碑刻拓本与法书性质相近,应当也属于明初秘书监的保管范围。

除了刻本书籍、法书、碑帖,“都省书画之印”还出现在绘画册页上,绘画册页从装帧形式看与书籍相似,可以翻阅,故元代《秘书监志》称绘画册页为“看册”。因此,绘画册页在明初很可能一度与法书墨迹、碑刻拓本等同被归入典籍类,亦由秘书监收藏。在钤印体例上,书法册页采用和刻本书籍完全相同的体例,也可看出册页与刻本形制上的近似性。现存极个别绘画手卷上也出现了“都省书画之印”,如印是可靠的,则该手卷很有可能是由册页改装而来。宋濂洪武九年时曾提到,东宫所藏图书中有赵孟頫所画《豳风图》,前有赵书《诗经·七月》之诗,原系“方帙”,太子朱标“恐其开阖之繁,当中折处丹青易致损坏,命良工装褫作卷轴,以传悠久”^①。如赵孟頫《豳风图册》原先系作为图书移交大本堂,并钤“都省书画之印”,改为手卷后就会呈现作为绘画手卷而钤有“都省书画之印”的面貌,这也能解释为何绘画手卷钤有“都省书画之印”的数量极其稀少。

五、结语

明初洪武内府保管书画的机构,现在比较明确可知的是宦官机构纪察司(亦称典礼纪察司)及其继承者司礼监,存世的元以前书画仍有不下百件钤有“纪察司印”。不过,明初宦官机构的建立及发展完善有一个过程,纪察司并非最初就设立的宦官机构,设置目的也并非为了收藏书画。明代建立之初,朱元璋鉴于汉唐宦官干政的现象,一度认为内侍宦官的职能应仅限于“供洒扫、给使令、传命令而已”^②,书画收藏、书籍刊刻、宫廷画家管理等后来归入宦官机构的职能起先均由其他机构行使。

在明政权创建过程中,最初获取的典籍、书画类物品应由较早成立的江南行中书省或中书省保管,存放于中书省架阁库之类的机构。洪武元

^①宋濂著,黄灵庚编辑校点:《宋濂全集》卷三八《恭题豳风图后》,第842页。

^②《明太祖实录》卷三一,洪武元年四月丙辰,第552页。

年中书省正式分设六部后,典籍、书画当划归礼部书画库,同年部分书籍调拨大本堂。洪武三年三月,随着秘书监成立,原中书省礼部保管的书籍、法书、碑帖、绘画册页当又大量拨交给秘书监收藏。洪武六年正月,朱元璋选拔俊逸之士入禁中文华堂肄业,以宋濂为师,文华堂亦富藏书,且其修业读书之职能与大本堂接近,“每食,皇太子、亲王迭为之主”^①,很可能接收了部分或全部大本堂的藏书^②。另外秘书监很可能又陆续调拨了部分图书至文华堂,故当时“四库之书多藏文华堂”,文华堂之书由翰林院官员负责管理^③。

李万康曾推测“都省书画之印”“礼部评验书画关防”往往同时出现与元代秘书监的收贮勘合制度有关,两印虽非元代官印,但这一观点仍有启发性。“都省书画之印”及“礼部评验书画关防”有可能是中书省和礼部在拨交清点相关藏品给大本堂、秘书监、文华堂等机构的过程中所钤盖。洪武中期以后,内府宦官机构逐渐完善。洪武七年,内正司设立,后改名为监察司、典礼监察司,并赋予其书画收藏保管职能,一部分礼部书画库藏品应当拨交给监察司。洪武十三年,随着中书省、秘书监、礼部书画库的撤销,其所藏法书、名画等当转拨监察司,并由洪武十七年成立的司礼监所继承,大本堂及后来的文华堂、秘书监所藏书籍则皆归翰林院保管。永乐中,明成祖下令南京翰林院藏书每种选一部运送北京,元刻本《资治通鉴》《六书故》等钤有“都省书画之印”的图书应在此时来到北京,并被正统时期编纂的《文渊阁书目》收录。

【作者简介】赵晶,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明史、中国艺术史。

①《明太祖实录》卷七八,洪武六年正月甲寅,第1426页。

②汪桂海:《大本堂考》,《文献》2001年第2期,第113页。

③宋濂著,黄灵庚编辑校点:《宋濂全集》卷二六《送甘肃卫经历张敏行之官序》,第538—539页。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六

宋紀八

起重光至開禧
凡三十四年

太祖文皇帝下之上

元嘉二十八年辛卯春正月丙戌朔魏主大會羣臣於瓜步山上班爵行賞有差魏人緣江舉火太子右衛率尹弘言於上曰六夷如此必走丁亥魏掠居民焚廬舍而去胡誕世之反也江夏王義恭等奏彭城王義康數有怨言搖動民聽故不逞之族因以生心請徙義康廣州上將徙義康先遣使語之義康曰人生會死吾豈憂生必為亂階雖遠何益請死於此恥復憂遷竟未及往魏師至瓜步人情怙懼上慮不逞之人復奉義康為亂太子劾及武陵王駿尚書左僕射何尚之屢啓宜早為之所上乃遣中書舍人嚴龍齋藥賜義康死義康不肯服曰佛教不許自殺願隨安處分使者以被拚殺之江夏王義恭以碣礫不可守召上立謨還歷城魏人追擊敗之遂取碣礫初上聞魏將入寇命廣陵太守劉懷之逆燒城府船棄盡帥其民渡江山陽太守蕭僧珍悉斂其民入城臺送糧仗詣盱眙及滑臺者以路不通皆留山陽蓄陂水令滿須魏人至決以灌之魏人過山陽不敢留因攻盱眙魏主就臧質求酒質封使便與之魏主怒築長圍一

自將騎十萬車十五萬兩擊柔然度大漠旌旗千里柔然處羅可汗遠遁其別部烏朱駕頽等帥數千落降于魏魏主刻石紀功而還初上在江州山陰戴瀾與戴明寶蔡閑為典籤及即位皆以為南臺侍御史兼中書通事舍人是歲三典籤並以初舉兵預密謀賜爵縣男閑已卒追賜之時上親覽朝政不任大臣而腹心耳目不得無所委寄瀾與頗知古今素見親待魯郡巢尚之人士之末涉獵文史為上所知亦以為中書通事舍人凡選授遷徙誅賞大處分上皆與瀾尚之參懷內外雜事多委明寶三人權重當時而瀾與明寶大納貨賄凡所薦達言無不行天下輻湊門外成市家產並累千金吏部尚書顧覲之獨不降意於瀾與等蔡興宗與覲之善嫌其風節太峻覲之曰辛毗有言孫劉不過使吾不為三公耳覲之常以為人稟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唯應恭已守道而聞者不達妄意僥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乃以其意命弟子原著定命論以釋之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八



国家图书馆藏元魏天祐刻本《资治通鉴》第十册首叶及末叶

详参赵晶《“都省书画之印”新考——兼谈“礼部评验书画关防”的时代》一文